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中国民族简史

吕振羽 著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K28
L904

中国民族简史

吕振羽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赵立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简史/吕振羽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人民文库)

ISBN 978-7-01-007024-7

I. 中… II. 吕… III. 中华民族-民族历史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4168 号

中国民族简史

ZHONGGUO MINZU JIANSHI

吕振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7024-7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 1921 年 9 月，重建于 1950 年 12 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 2 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初 版 序

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客观上已迫切需要解决;在我们的主观上也早已提到行动的日程。但我们对国内各民族,尤其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还相当隔膜。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大都从侵略主义的观点出发;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则大都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御用的著作,尤其是“陶希圣校对”的《中国之命运》,便不过是封建买办法西斯大民族主义的扯谎宣传,是其对中国各民族和人民的挑战。这对于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因此,我这本小册子——《中国民族简史》稿,由于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虽有不少缺点;但把它印出来,提供给工作者和研究者作参考,我以为不是全无意义的。

这本小册子,是在工作和行动过程中写的;所根据的材料,由于条件的限制,仅是:(一)自己在工作和行动中的实地接触与调查,(二)身历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们的口述,(三)在工作和行动中所能搜集到的一些书籍杂志等。内容上,由于著者生活的繁忙、动荡和材料搜集不全面,不仅可能有不少错误,而且对有些民族仅能粗枝大叶地叙述,甚至没能加以叙述。为弥补缺点和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自己将从实际工作中去实地体验和调查研究,不断加以充实和修改,并希读者和同道帮助。

我们在工作和行动中实地接触几个少数民族的情况后,不只发见了一些书本材料大多不可靠,且改变了我自己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认识。因此,我更深的感觉到,从事研究工作的进步史家和民俗学者,应从单凭书本等死材料出发的方向,转入实地调查研究和具体斗争出发

的方向,掌握活的情况,获取活的材料,并从这种基础上去认识、抉择和应用书本材料。同时,我也更加相信,在这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中,较年轻的一代将从实际斗争里面,锻炼和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史家和民俗学者……他们将远远胜过我们这一代。

我自己在过去的一些著作中,由于实际生活的不够,常不免为人家书本的虚伪与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构成一些不切实际的乃至错误的论断。如在一九三三年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即《中国原始社会史》)里面,关于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我忽略了第二个主要来源的马来人种,同时把一些马来人种系统的民族,误认为蒙古人种的系统;在一九四〇年的《简明中国通史》里面,对于回族,也强调了他们的宗教性,不自觉地作了人家的尾巴;在一九三四年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即《中国奴隶制及初期封建制度史》)和一九三六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里面,于历朝封建统治者对国内人民和少数民族所叫嚣的“正统”问题、所施行的改良政策,都相当忽视,没有足够的去把握其实际意义……。这都是我自己已明显感觉到的。以讹传讹,好些进步史家也跟着我形成同样缺点,犯了同样错误,我应向他们和读者道歉;不过我又当声明,表现在那些拙著中的我的系统见解和认识,到今为止,并没有基本改变。如我一九三〇年在《益世报》所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诸阶段》关于中国社会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承不少新史家赞同,我自己也还没有改变那个基本见解。但这不是说那已是完全正确的,恰恰相反,在今后由于新史料的发现与史学水准的提高,是完全可能把那种论断推翻的。

应附带提到的:(一)过去大汉族主义者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称谓,如“猫”、“猯”、“獠”、“蛮”、“蜑”等等,好像只有汉族是“人”,其他民族便是“犬”或“虫”……。为正名起见,我便将“犬”或“虫”丢去,或加以“”号。(二)许多同志给了不少帮助,提示宝贵材料,特别是彭光涵、王时真两同志给了我很多的实际帮助,提出不少可贵意见,我衷心地感激他们。

著者 一九四七,二,二〇。

增订版序

—

今天的国内形势,与一九四七年我写这本小册子时,已发生根本变化,因而国内各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也根本变化了。

一九四七年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主席在其著名的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新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因此,当时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统治,消灭封建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即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基本上还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所一贯指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就是后来《人民政协组织法总则》所规定的:“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今天,“……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也正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序言》所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除西藏及台湾、金门等几个海岛外,全国各民族都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西藏及台湾等也即将获得解放,即将完全结束内战,在全国范围进入和平建设的阶段。“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因此,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任务,正如《人民政协组织法总则》所说:“……肃清公开的及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并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所一贯提出的方针任务的体现,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所一贯提出的基本原则的体现。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就又一次这样提过:“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民族的统一与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当时“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与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才能实现这个伟大任务。现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以雄伟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在斯大林大元帅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缔结了兄弟同盟条约,这使苏中友谊变成了巩固和平的强大力量。这力量无可匹敌,并且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无可匹敌的。”(莫洛托夫)特别对于中国,“这个条约及其协定的签订,使我们中

国有了自己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同盟国,从而就巩固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中国被破坏很严重的人民经济将很快地恢复与发展起来……。”(刘少奇)

因此,在当时的形势及与之相适应的方针任务的指导下,这本小册子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在今日新的形势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方针任务下,便表现着过时和不恰当了,失去实践的现实意义了。因此,便抽出一段时间,就校样略加修改,以期能与新形势下新的方针任务的指导原则相适应,与当前的革命实践相适应。

二

在人类史上,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已彻底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而且历史已经证明:“苏维埃的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帜下,达成了“……各民族的伟大友谊以及兄弟般的合作与互助”,“……都在沿着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莫洛托夫:《斯大林和斯大林的领导》)这由于它消灭了资本主义,肃清了民族压迫:“……支配民族与被支配民族的问题,殖民地与宗主国的问题,都放在历史档案里面去……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勃兴,他们有着同等的权利、有着同等的发展机会……。”(斯大林)除开这种最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就只有我们这种“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根本肃清民族压迫,使各民族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发展机会,才能真正实行各同族的团结、互助与友爱合作,才给予各民族在自愿与民主的基础上共同来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并共同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因为在我们这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已根本被推翻,并将被根绝;从资本主义基础上出现的民族压迫,在这里没有产生的可能。

但是“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前揭毛主席开幕词）因此，各民族人民，首先还要共同努力来保卫和巩固我们的胜利。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所规定的方针原则的条文化，就是各民族一律平等诸原则已成为我们的宪章，也就是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互助”与“友爱合作”被规定为我们国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无论是为着保卫和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为着建设我们自由幸福的生活，为着我们一切共同的要求和任务，都需要彻底贯彻各兄弟民族“团结互助”与“友爱合作”的国策。伟大导师斯大林早在其一九二一年的经典著作《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中就说过：

各苏维埃共和国如没有国家的联盟，他们如不团结起来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军事经济的力量，那不论在军事的战线上或经济的战线上都不可能抵御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

“大”列强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历史——唆使一个一个边疆资产阶级政府，唆使一群一群反革命的军人起来反对它，劳心焦虑地设法封锁它，以及一般力谋在经济上孤立它——所有这一切都很明白证明在现在国际关系之下，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不论那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如个别而论，它都不能认为自己已有保证，可以对付世界帝国主义方面的经济消耗与军事毁灭了。

……所以各苏维埃共和国孤立生存是不牢固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威胁着它们生存。一则各苏维埃共和国国防的共同利

益；二则被战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三则产粮食的苏维埃共和国方面对非产粮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必要的食物的帮助，都正在有力地指使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国家的联盟，这是从帝国主义奴役下和民族压迫下拯救出来的唯一道路。从“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要能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战胜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只有联合为一个密切的国家联盟才行，否则它仍是不会获得胜利的。

……基于军事和经济的事业的共同性而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乃是国家联盟的一个总的方式，这一总的方式：（一）可以保证各个共和国以及整个联邦的完整与经济的发展；（二）可以包括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的民族和人民的各色各样的生活、文化及经济状态，并可以根据此点应用某一联邦方式；（三）可以调整各民族和各人民的和平共居和亲密合作，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跟联邦的命运设法联系起来。

这在基本原则，对我们今天也是合适的。所以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论联合政府》）又说：“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前揭《开幕词》）因此，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原则上也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学习“它在苏维埃制度中发现了依据民族平等和自愿的原则而组织坚固的多民族国家的道路。”（斯大林：《论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而“盟员的自愿与法律上的平等”，正是“这个联盟的基础”。（斯大林）

在这种多民族国家内，斯大林说过：“民族自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呢？”“唯一正确的解决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以及高加索等等这些确定的单位的区域自治。”“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实行区域自治时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

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面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大家按民族标准实行划分,它不是巩固着民族间的隔阂,而是要破坏这种隔阂,并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开辟道路去实现其他一种划分,即按阶级标准实行划分。末了,它不必等待总的中央机关通过决议而可以最完善地利用本区天然富源,发展生产力……。”“无疑地,不论哪一个区域都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区,因为每个区域里都杂居着少数民族。……因此,有人就要担心少数民族会受多数民族的压迫。但是只有当国家还保存着旧制度的时候,这种担忧才有根据。如果国家具有完备的民主制度,这种担忧就没有任何根据了。”“有人主张把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统一为一个民族联盟。但少数民族并不需要来勉强造成的联盟,而是需要有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实际享受的权利。”(《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其过去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内的少数民族,就一贯地基于具体情况实施了这种原则。因此,《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民族政策》又明确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解放较早的内蒙古地区,已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就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已完全实现了这个原则。其他各少数民族地区或杂居着少数民族的地方,这种原则也已经或逐步在实现。在各级联合政府里面,政府委员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原则上都按照各民族人口的比例配置,各民族的要求和意见都能够充分的反映,政府凡处理关涉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都与他们充分协商和求得其同意。

三

各民族获得法律上的一切平等权利以后,并不就等于达到了事实

上的平等。斯大林说过：“……不过由于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原故，他们还保留若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平等。这一民族不平等的本质，就在于我们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则，得了过去的一种遗产，根据这一遗产，有一个民族即大俄罗斯，在政治上和工业关系上，比其他民族要发展些。因此，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在一年之内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它是应该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帮助落后民族的方法加以消灭。”（《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我们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有一个民族即汉族，在政治上和在工业关系上比其他民族要发展些，其他民族则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表现着不同程度的落后情况。因此，这种原则对我们也是完全合适的。所以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也早就说过：“应当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民众的领袖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并成立拥护民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应被尊重。”在这种原则下，《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民族政策》便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这在原则上，也已经或将要逐步去实现。如解放较早的内蒙古，“三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建设都有显著成绩。自治区内蒙汉族人民达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再没有民族的压迫、歧视、猜忌、仇恨和隔阂。在内蒙古自治区普遍建立了民主政权，肃清了土匪，安定了社会秩序，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人民得到了土地和自由，生产情绪和生产力大为提高，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目前除严重灾区外，一般均达到了衣食无缺，普遍添车买马，添购农具，修盖房屋。由于人民政府执行了奖励增畜政策，牲畜也大有增加，仅呼伦贝尔的羊即比一

九四五年八·一五时增加了一倍,由四十余万头增至八十余万头。文化教育上,学校、学生数目超过伪满很多。财政开支,已可保证,同时还积累资本进行可能的经济建设,一九五〇年的财政收支预算中,用在事业费和企业投资的约占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东北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但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乃是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斯大林说过:

……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乃是巩固工人政权的工作,然后在我们面前才发生了别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虽是很重要的,但是却隶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

可是显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中央工业区域,而不是本身为农民区域的边疆。要是我们牺牲无产阶级的区域,而倾向于农民的边疆方面,那末,结果定会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为之破裂。

应当牢记,民族问题的活动范围及其权限的限度,在我们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之下,要受工人问题(一切问题中的基本问题)活动和权利的范围来限制的。(《论民族问题》)

伟大导师列宁也早就说过:“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民族问题的隶属意义,对马克思是毫无疑义的。”(《论民族自决权》)这虽然都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说的,但对于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原则上也是适用的。我们如果不把全部工作的基础,首先而且主要的放在工业区域,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从而也就与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各民族人民既得的胜利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们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倍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们的基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是不能巩固

的。”(《论联合政府》)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政府现时全部工作的中心,便放在工业有相当基础的区域,恢复和发展工业、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事业,其中并以工业为中心,“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升到工业国地位上去。”

而我们,由于斯大林和伟大苏联人民国际主义的友谊援助,由于他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签订了由中苏经济合作在新疆创办两个联合股份公司的协定,这不只使多民族的新疆乃至西北,将迅速赶上先进区域走上工业化的大道,且将大大帮助和加速全国工业化过程。而此却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所不能获得的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情况。

但这不是说,我们对民族问题、对帮助各少数民族文化经济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就全部搁置起来;只是说,它是处在服从于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的地位,服从于首先而必要的总体的利益。事实上,不只是国家工业化问题如不获得解决,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无由巩固,而且只有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展,才能大步的有效的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事业前进。另一方面,在区域自治的原则下,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事业,是不容许也不致有何等待,就会完善的利用一切条件去进行建设和发展的;这种建设和发展,不只符合于该区域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与全国及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利益和要求相一致的,与国家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的任务相配合的。

四

我们不止于达成各民族在法权上的平等,而是要达成真正的平等,以至于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类。斯大林说过:“各民族真正(不仅法权的)平等的成分(如帮助、协助落后民族高升到超过他们的各民族的文化、经济水准),这是建立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亲密合作的条件之一。”“由此可知,仅仅限于‘民族平等’,那是不可能的,而需要从‘民族平等’进而采取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方法,进而制定并实施关于下列各问

题的办法：(一)研究落后民族与殖民地的经济状况、生活文化；(二)发展他们的文化；(三)他们政治的启蒙；(四)逐渐而慎重的使他们与最高经济形态衔接起来；(五)调整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合作。”(《论民族问题》)这是我们的方法和步骤，也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而且是按照这种原则实践的。

中国境内各民族，在解放前，除中央区域外，有的进到了半封建状态，农业虽占了主要地位，封建性的牧畜业还占相当比重(如回区和内蒙古区)，近代企业极少(如回区)，或到解放后才出现一些现代企业(如内蒙古区)；有的还在封建制状态下，盛行着封建性的牧畜业和农业，完全没有近代企业(如西藏)；有的还滞迟在奴隶制状态中(如唐古特区即所谓“西番”区和罗罗区)；有的甚至还滞迟在原始的牧畜(如苗族的某些部分与哈萨克区等)以至渔猎状态(如黑斤奇勒族等)……。从另一方面说，有的有着固定的住区(如藏族等)；有的住区虽固定，但被挤成插花状态(如蒙回等)，甚至被分割得很零碎或被排挤到荒僻的“山间岩阿”(如苗傜族等)；有的还没有一定的领土，形成一种定期游牧的状态(如布鲁特族、鄂伦春族等)以至被排挤到水上(如“登”民)……。帮助、协助他们由不同的历史状态中“高升到超过他们的各民族的文化、经济水准”，“使他们与最高经济形态衔接起来”，这是肯定不移的原则方针、不容改变的要求，也是共产党人的任务。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斯大林在一九二一年是这样提示的：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及与它联盟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约有一万万四千万居民。其中非俄罗斯人，约有六千五百万……。沙皇主义的政策，地主资产阶级对这些人民的政策，就在于杀死他们中间一切国家的萌芽，蹂躏他们的文化，抑制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永处于愚顽无知之中，并尽可能使他们俄罗斯化。这一政策的结果，便是这些民族的不发展与政治的落后。

在地主资产阶级被推翻和这些区域内劳苦大众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的现在，党的任务就在于帮助非俄罗斯民族的劳苦大众赶